

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807

前　　言

江苏素称人文荟萃之地，历代名人辈出，史不绝书。近现代以来，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艺等各界中，杰出的江苏人物，亦指不胜屈。杰出的历史人物是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的代表，他们往往是一种政治运动、经济趋向、思想潮流的标志。征集研究他们的生平活动，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当时的时代动态和这些历史人物所起的社会作用。

今后我们将陆续征集编辑出版戊戌变法以来江苏籍的名人或长期在江苏活动的知名人士的历史资料，暂定名为《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以征集史料先后分册出版。

《江苏近代历史人物》第一集内容提要：

天文学家张钰哲为我国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一生从事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和轨道计算，五十年代起即担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长。经过四十年的观测研究，在他的带领下，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到1000多颗在星历表上没有记载的小行星，并计算了它们的轨道，其中99颗小行星获得了国际永久编号和命名权。而且他们建立了太阳系天体摄动运动动力学数值模型，提出了研究天体轨道长期演变的方法，对我国天体力学、方位天文学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

范旭东先生是一位有雄心壮志的爱国实业家，他毕生精力花在化学工业上，对奠定我国化学工业基础有突出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谈到中国工业发展史时就说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他以创业者的气魄，先后创立了“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实业团体。范旭东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

拟有发展十厂计划，可惜他积劳成疾，于1945年10月赍志而歿，否则他于民族工业将有更大的贡献。

史量才先生为我国报业巨子，《申报》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团结抗日，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多所抨击和揭露，深中时弊，引起蒋介石的仇视，1934年11月13日，为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浙江海宁境内。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著述的《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写的中国通史，曾长期用作学校教材。他一生著述甚富，深受史学界重视。本集除选录了吕先生的传记外，并刊有他早年学生黄永年教授《怀念吕思勉老师》一文。弟子亲炙之见闻，更能传神这位历史学家的教学风采。

徐悲鸿先生为当代杰出的艺术大师，卓越的艺术教育家，他的艺术作品固早已传播中外，蜚声艺坛，而系统地介绍他生平的文章甚少。今谨选刊杨建侯教授《忆徐悲鸿老师》及其同乡整理的《徐悲鸿在家乡》两文，读者可以了解这位艺术大师青少年时代的家乡生活及后来从事艺术教学风范的一斑。

钱松嵒先生为当代著名国画家，少无师承，日砥月砺，自学成才。迨乎晚年，师法自然，匠心独运，漫漫然自成一家。今征得其手著遗作《皓首忆童年》一篇，文字朴实感人，乃作者自述少时艰苦习画，循序渐进的甘苦之言，读之令人奋发。后附其女钱心梅《我的父亲钱松嵒》一稿，写的虽是一部穷画家的家史，实质是旧社会中一班穷知识分子寒酸生涯的缩影。

敬希作者同志和读者们共同关心，踊跃来稿，匡谬正误，为使《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这套史料，能够日臻完备而不吝赐教。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爱国报人史量才

• 史量才印 •



此印为汪英宾所治。印右侧有汪氏题刻：“戊辰小春为量才先生治印篆毕自读略有封泥之气息”。



历史学家吕思勉



1941年吕思勉在上海合影

△者为吕思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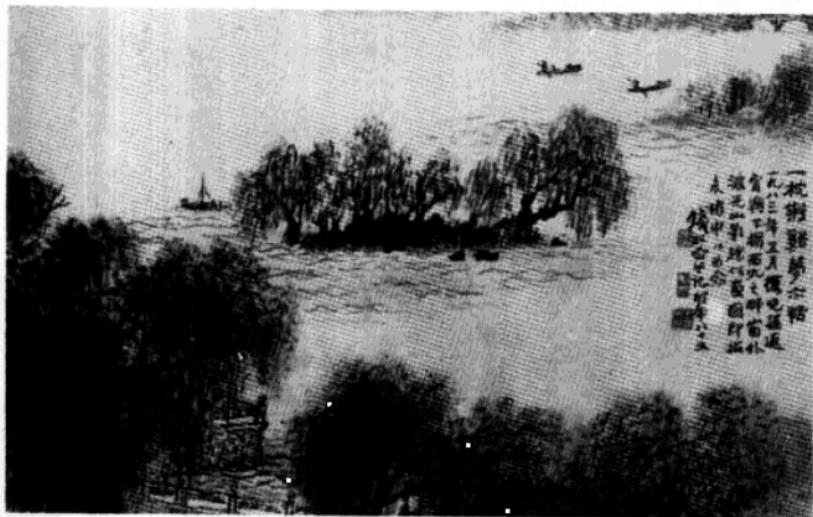
徐悲鸿代表作



徐悲鸿画马



艺术大师徐悲鸿



钱松嵒和他的代表作



目 录

- 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 尉淑玲 杨建(1)
〔附〕张钰哲年表
- 回忆化学工业家范旭东 许复七 口述(24)
范旭东与永利塘沽碱厂 许藤八(38)
范旭东和中国近代化学工业 张能远(47)
爱国报人史量才 窦天语(97)
〔附〕史量才生平主要事迹年表
- 历史学家吕思勉 陈吉龙(140)
怀念吕思勉老师 黄永年(174)
忆徐悲鸿老师 杨建侯(185)
徐悲鸿在家乡 蒋行知 整理(198)
〔附〕徐悲鸿年表
- 皓首忆童年 钱松岳 遗作(214)
我的父亲钱松岳 钱心梅(241)

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

尉淑玲 杨建

1986年7月21日上午11时5分，我国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和江苏省委员会委员张钰哲因病在宁去世。噩耗传出，天文界大为震惊，国内外纷纷发来了唁电、唁函，有的天文爱好者自费从外地来到南京参加追悼会，充分表达了人们对这位著名学者的深切哀悼。

1985年11月中旬，他还精神抖擞地夜登紫金山，再次目睹哈雷彗星的光辉，实现了他两次见到哈雷彗星的愿望；1986年2月9日和4月21日哈雷彗星过近日点和近地点时，他还为天文爱好者和集邮爱好者们在首日封上题名留念。7月14日他还亲自参加美籍华裔天文学家范章云教授所作的“从太空飞船到哈雷彗星”的报告。就在他昏迷的7月15日那天，上午他仍然和往常一样到天文台办公大楼去上班，下午他还和他的两个学生一起讨论学科发展的有关问题。谁又能想到，7月13日他在家中不幸跌交引起了脑血管破裂，就在这两天内，血正从他破裂的脑血管中慢慢向外渗出，死神正在一步步向这位为天文事业耗尽毕生精力的科学家靠近。从7月15日下午4时开始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在走完了84年的人生道路，完成了应尽的历史使命之后，他安详地与世长辞了。

出身贫寒 心怀壮志

1902年2月16日，张钰哲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当铺职员家庭。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他有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妹，一家跟着寡母清贫度日。他到了入学年龄，家里却无力承担他上学的费用，他只得靠申请免费才进了福州市的明伦小学。在那个时代，小学读的书还是从前科举时代必读的《孟子》、《左传》一类古书。这些书虽对他日后走上科学的研究的道路没有多大影响，却奠定了他良好的文学基础。

1910年5月，天空里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它拖着长长的尾巴，引起无数人的注意，这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年仅八岁多的张钰哲看到了这壮观的天象，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大约在他十二岁时，偶然看到一本吴稚晖写的《上下古今谈》。书里以两人出游对话的形式，通俗地介绍了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引起了他对冥冥苍天的兴趣。这两件事为他后来终身从事天文研究留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在美国留学时，这颗种子找到了合适的土壤，终于生根、发芽、成长了。

在张钰哲小学将要毕业时，他的二哥到北京审计院工作，并把全家接到了北京。在北京，张钰哲先在畿辅中学读书，两年后转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就读。生活的艰难使他从小就懂得节俭，从来不乱花钱，有了一点零钱就积起来买书。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门门功课成绩都很好，对英语特别努力。在附中四年，毕业时考了第一名，并得到一本奖品英文世界地图集。他于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学堂高等科，这是美国用部分“庚子赔款”兴办的留美预备学校。该校不收学费，毕业后还可以被选送出国，是勤奋好学的有志青年神往的学校。清华要求毕业生体育必须及格，其中游泳考试的及格标准是游过50米长的游泳池，所以

当时大家讲笑话说，游过这50米就可以渡过太平洋了。张钰哲游泳技术不佳，好不容易才达到及格标准。

出国深造 转学天文

1923年张钰哲远渡太平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他平常认为中国最需要的人才是工程师，所以到美国之后就进了普度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但不久他便感到不合志趣。他觉得平时喜欢作画，何不从事美术与土木工程相结合的建筑呢？于是就转到康奈尔大学的建筑系。在那里，像透视画、材料力学和铅笔画这些科目，他的学习成绩都不错。有一次作人手石膏模型的素描，还得了金牌奖，并在展览会上展出。但他的水彩建筑设计却得不到老师的好评。就在这时，他偶然阅读了一本天文学科普及书，书中讲太阳和月亮距离以及日月食预报，觉得十分神妙有趣，幼时观看哈雷彗星留下的种子，终于萌芽了。1925年他毅然决定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天文系。这次转学决定了他的毕生道路。他在那里学习了一年，成绩优秀。1926年夏，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三个季度后被派往叶凯士天文台用中星仪测定纬度，作为写硕士论文的准备。

当时任叶凯士天文台台长的弗罗斯特(Frost)已经双目失明，但是这位台长对整个天文台了如指掌，甚至上楼有几级楼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因此他能领着张钰哲在天文台各处参观。有时张钰哲问他一些数据，他也能立即说出这在《天文年历》的第几页上可以查到。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使年轻的张钰哲极为钦佩。阴天的夜晚不能进行观测，张钰哲读几页书给他听，他随时纠正英语发音，这对张钰哲的英语有不少帮助。

1927年，张钰哲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继续留在叶凯士天文台工作，在樊比博(Van Biesbroeck)教授的指导下用口径60厘米的

反射望远镜从事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樊比博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美籍比利时人，比张钰哲年长20岁，但他毫无长者的架子，对这位中国学生关心备至。樊比博一生从事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研究，一直工作到90多岁的高龄。他去世后，以他的姓氏设立了奖学金，月球上有一个环形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还有一颗彗星也被命名为“樊比博彗星”。

1928年11月22日晚，张钰哲发现了第一颗编号为1125的新小行星。在此以前，虽然已发现的小行星有1100多颗，但没有一颗是中国人发现的。按照当时的国际天文界惯例，小行星通常由发现者为它命名，这是给努力工作的天文学家的权利和荣誉。当时这位年仅26岁的青年学子，身处异邦，怀念祖国，他把这颗星定名为“中华”，以示希望中华能再度崛起。这颗小行星的发现，为我国当时极其落后的天文事业争得了荣誉。

张钰哲不仅跟着导师进行观测，还从事小行星和彗星的轨道计算。樊比博给他的题目是研究双星轨道平面的空间取向有没有什么规律。这是一个新题目，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从搜集观测资料到进行计算、分析处理，他经过近两年日夜辛苦的劳动，终于在1929年夏写出了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的博士论文。经过论文答辩，张钰哲获得了天文学博士学位。当天，樊比博夫人特地做了一个大蛋糕送给他以示庆贺。张与樊比博一家的师生情谊一直很深，张钰哲1984年访美时，还专程去看望了樊的女儿。

学成归国 艰苦奋斗

学业完成，张钰哲遥望祖国归心似箭。1929年秋，他决定启程回国。回国之前，为了更多地了解国外天文研究的发展状况，他考察了美国的洛威尔天文台、里克天文台、威尔逊天文台和加

拿大温哥华的维多利亚天文台等世界闻名的天文台，看到了现代天文台的研究设施。他从温哥华搭乘“皇后号”远洋轮回到上海。

回到离别六年多的祖国，张钰哲十分希望能为祖国的天文事业贡献自己的学识，一展抱负。但是旧中国满目疮痍，科学落后，中国之大，竟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天文台。他只能在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讲授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等课程，同时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通讯研究员。

离开了望远镜，中断了天文观测，使从事天文研究的张钰哲难以工作。他托人从美国买了一套30厘米大小的光学玻璃，在学校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内，自己动手设计，研磨望远镜。他将业余时间全部用在这上面，先是粗磨，然后是细磨。他渴望能有一架望远镜，以便进行天文观测。然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他制作望远镜的工作只得随之停顿。

抗日战争时期，张钰哲带着妻子、儿女，随学校迁到内地。他们辗转抵达重庆，夫妇俩分别在大学和中学教书，生活极不安定。1941年元旦，张钰哲只身从重庆飞到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天文研究所原设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内，南京沦陷前，从南京迁到了昆明凤凰山上。当时凤凰山上只有一具很小的照相望远镜，根本无法进行小行星的照相观测。他就根据过去积累的资料，靠一台破旧的计算机，计算小行星的轨道。他的生活甚为艰苦，身为所长，有时却要卖掉一些东西来贴补生活。当时他的好友吴有训夫妇曾在生活上给了他不少照顾，在那种艰苦条件下，他得了胃溃疡，直到1963年冬才在北京医院作了手术治疗。

1941年9月21日，在我国福建、浙江、江西、湖北、陕西、甘肃、新疆境内可看到一次日全食。日全食观测是研究太阳的绝好机会。但是当时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只能分别在甘肃、福建组成西北、东南两个观测队进行观测。在抗战时期要组织一次远在

数千里以外的日全食观测实在是困难重重。经费拮据，他就千方百计募集款项；仪器缺乏，他就向各方借用，或设法自己解决。例如望远镜筒在内迁时丢在南京未及运出，他就造了一个木架蒙上黑布来代替镜筒。又如涡轮涡杆配合很差，致使定天镜走动不匀，太阳象经常跳动。如果在日全食时跳动一下，那就前功尽弃了。他和观测队员们一起想出了逐段检验涡轮涡杆的办法，挑出一段配合较好的，作好标记，并且计算了日全食过程，调整定天镜，使日全食到来的这段时间，正是涡轮涡杆走到配合较好的那一段，完美地解决了问题。张钰哲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困难的能力是令人钦佩的。

1941年6月底，他率领一支十人组成的西北观测队从昆明出发，携带必要的仪器设备，先乘火车到曲靖，然后改乘卡车，穿越云贵高原，经七十二转弯、筠丝岩、娄山关入川，跨嘉陵江，经重庆、成都，过剑门关，由栈道出川，再翻越秦岭，经天水奔赴甘肃临洮。一路上历尽艰难险阻，沿途还多次碰上敌机空袭。有一次，当观测队乘坐的卡车快到重庆时，一批又一批敌机从头顶飞过，投下的炸弹就在周围爆炸，气浪掀起的尘埃和土块飞溅到汽车上，幸好人未受伤。他们好不容易才到达临洮，在以后紧张地进行观测准备的日子里，敌机还先后四次飞到这个偏僻的县城，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日食当天，幸而天公作美，万里无云，观测获得圆满成功。另一支前往福建崇安的东南观测队则因天阴雨没有取得成果。西北观测队拍摄到了日全食过程的彩色电影，并对日全食时的天空光度进行了测定，获得很好的科学成果。张钰哲后来完成了“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一文，于1942年在美国的《大众天文学》杂志上发表。但在四十年代战时的中国，拍摄的彩色电影胶卷在国内不能冲洗，只能拿到印度去冲洗。可以想象，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进行这样一次日全食科学观测是非常了不

起的事情，张钰哲为此费尽了心血，在全体现测队员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珍贵的观测资料。这次在特殊环境进行的天文观测活动，在中国科技史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在此期间，张钰哲的母亲不幸逝世。由于张钰哲从小跟着寡母长大，所以他对他母亲的感情很深。究竟是尽孝守候在母亲病榻旁，还是尽职率领观测队完成任务呢？他在两者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这是在山河破碎的抗日年月里，我国第一次成功的日全食观测。张钰哲在途中写了一首诗：

久矣风沙不关心，滇池秦塞事长征。
情怀病骥思归卧，世事鞭驱未感怜。
赖有耆年垂矩范，孰云星历俳俳伶。
更祈异象呈空日，云雾寇氛俱扫清。

这首诗既表达了他忠于职守的可贵情操，又显示了他当时希望日全食观测成功，期待把日寇赶出我国的心情。

当时临洮地区的群众科学知识贫乏，对日食流传着种种迷信和传说，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为此，观测队在准备观测的同时，还作了普及天文科学知识的讲演，为破除迷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群众看到了日全食的过程，高兴地称他们是“天文王”。

抗日战争期间，张钰哲除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尽全力坚持科学工作外，还通过多种途径呼吁要重视科学研究。1942年12月25日是伟大科学家牛顿诞生三百周年，张钰哲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纪念牛顿诞生三百周年”一文，论述基础科学的重要性。1945年，重庆《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吹捧一个用八卦推算出“木王星”的人。同年11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张钰哲于12月16日在重庆《大公报》第一版《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你知道行星是如何发现的吗？”一文，对那种伪科学进行了驳斥。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张钰哲敢于挺身而出，为科学真理仗义执言，表现了正直科学家的高尚气节。

抗战胜利 二次出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天文研究所迁回南京紫金山上。1946年张钰哲被政府派往美国作访问学者。旧地重游，他又来到叶凯士天文台与老师樊比博一起工作。相隔17年以后，美国的天文研究已有新的进展。那时美国南方的麦克唐纳天文台有一台口径2米的反射望远镜，可供叶凯士天文台的天文学家观测使用，叶凯士天文台台长让他到那里去用这台较大的望远镜进行分光双星的光谱观测。他将观测结果写成论文《大熊座W型交食双星的光谱观测》，当年发表在美国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他还在叶凯士天文台的变星观测中发现了一颗新变星。1946年冬，他应邀参加了在波士顿城召开的美国天文学会年会，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一颗新的食变星的速度曲线》的论文，同年也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这次访问历时两年。1948年3月，他准备回国，但那时的政府派他出去却不发给回国的路费。他的夫人陶强在国内四处奔走呼呼，毫无结果。面对这种情况，有人劝他留在美国，甚至连他夫人的工作都作了安排。但他要回祖国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樊比博十分理解他这位中国学生的心情，也在替他想办法。说也凑巧，1948年5月9日，亚洲阿留申群岛到中南半岛一带可以看到日环食，为此，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要派一个观测队到我国浙东余杭进行观测，樊比博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帮他申请参加了这个观测队，天不作美，日环食当天遇上阴雨，观测队的工作虽没有成功，张钰哲却成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任重道远 贡献卓著

张钰哲第二次从美国回来，带来了在国外应用光电倍增管观测暗弱天体光度的早期信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人财两缺。无法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面对这种局面，他意识到复兴中国天文研究的使命，主要在紫金山天文台，因此，他根据当时天文台的仪器设备状况，确定对小行星的定位定轨工作是当时在紫金山天文台唯一能够开展的工作。当时定位测量是在原物理所利用光谱波长比较仪做的，计算是用对数表作工具的。张钰哲创造了用一维工具作二维测量的方法，使x和y两个坐标方向的精度都达到应有的水平。此时他才放心地开展这项工作。张钰哲根据1948年的实际情况，开展他所熟悉的一个研究领域，得到了成功。

1949年，张钰哲最后决定不去台湾，把天文台的图书仪器都完好地保存下来。那个时候，只有他作为所长才能作出这个决策，为新中国的天文事业立了一大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5月20日天文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任台长，聘任书是国务院发的，上面有周恩来总理签名。张钰哲对此非常珍惜。此后的16年可算是他的天文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

解放初期，张钰哲向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及副院长吴有训申述了恢复60厘米镜以利于在我国开展天体物理和小行星的观测研究的重要性。1954年秋，60厘米反射望远镜由民主德国蔡司工厂技术人员修好，被用来作小行星、彗星、恒星的照相观测。

在20厘米和60厘米两个望远镜的观测圆顶室内，张钰哲带领一批年青人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们有时共吃几片张老带来的苏打饼干。这些年青人在这里学会了天文观测的基本技术，日后